

『延安故事』传播的成功之道

□ 于安龙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政治污蔑，通过积极开展与外国记者的互动交流，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打开了对外宣传的窗口，实现了“延安故事”的广泛传播。面对复杂的局势和重重阻力，中共另辟蹊径，借助外国媒体和记者打通了向外“发声”的渠道，成功将“延安故事”传播到国内外，为中共赢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广邀外国记者来访

中共高度重视外国记者来访，并将其视为与外界交流的难得机会。斯诺之所以能到陕北访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提议选择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人”访问根据地。正是在中共的邀请和推动下，斯诺成为“第一个冲破艰难险阻到苏区来调查了解”情况，“并将事实公诸于世的外国记者”。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是在正式接到中共的邀请后，到延安访问的。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是一次人数多、规模大的集体性访问。虽然此次访问历经曲折，但中共的热情邀请是其最终能够成行的重要原因。1944年2月中旬，董必武同各国记者谈话，邀请他们前往边区考察。2月26日，董必武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建议为迎接外国记者做准备。周恩来于28日即回电，安排专人护送记者团赴延。3月9日，周恩来受毛泽东、朱德和中共中央委托，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对记者团访延表示热烈欢迎。4月30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转11位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只要国民党政府同意“即可动身”。屡次盛情相邀，充分展现了中共诚恳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外国记者们的顾虑和担忧，最终促成了他们的西北之行。

中共对来访的外国记者，都以礼相待，高度重视接待和服务工作。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专门就如何对待英美新闻记者等问题发布党内指示，要求“对于接洽访问之英美人员，不仅不应该采取不合理或冷淡的态度，而且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访之前，周恩来专门召集边区党、政、军、民、学各部门负责人开了

老实做人、做老实人，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内在要求，是领导干部“官德”的外在表现，也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对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然，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这也没有什么，历史总会正确地评定一个人的功过的。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人都要做老实人。”

“老实人”，是毛泽东对罗荣桓中肯的评价，也是罗荣桓一生的写照。罗荣桓自参加革命以后，始终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计个人得失，勤勤恳恳，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甘做党和人民的“老实人”。

1927年9月29日，当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时，形势十分严峻。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旧军队中打骂士兵的习气仍然存在，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召开党的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

动员会，介绍记者团具体情况及其来访目的，传达中共中央接待方针政策，还向各机关借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来帮助做好接待工作。党中央、毛泽东对此也甚为关注，强调要妥善安排各项接待工作。据胡乔木回忆，“事实上，凡涉及外交，事无巨细，都要汇报到毛主席那里，有时甚至连一些细小的事务也由他亲自布置安排”。中共对外国记者来访的重视还表现在，几乎每一位来访记者，都能得到中共领导人的亲自接见，有时甚至是彻夜长谈。斯诺曾回忆，他与毛泽东“一连谈上几小时，有时差不多谈到第二天黎明”。英国记者贝特兰回忆，某次谈话结束时，毛泽东把他和翻译送到院子里，还盛情邀请说：“你们一定再来，让我们一起再多谈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之后，毛泽东、朱德曾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介绍中共的有关政策。其中毛泽东与斯坦因谈话时，从14日下午3时持续到15日凌晨3时，长达12个小时。如此长时间、近距离地访谈交流，是外国记者来访的积极配合与协助，收到了“宾主尽欢”的良好效果。“毛主席很兴奋，与记者畅所欲言，因为总算是打开了局面。外国记者的情绪也很高，像发现了新大陆。”

开放记者自由采访

在接待外国记者来访的过程中，中共没有装模作样、弄虚作假，而是采取用事实说话的宣传策略。因此，“开放”和“真实”成为外国记者在延安的最大感受。1937年5月，海伦·斯诺抵达延安。在历时4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中，她访问了斯诺1936年已结识和未结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广泛接触了苏区的战士、工人、农民、学生、文艺工作者、妇女和儿童。她所采访的人，不少于65位。她所提出的数以千计的问题，绝大部分都得到了圆满的答案。从可见外国记者的走访时间之久、接触人员之多。对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访，中共制定的接待原则是敞开大门，让他们自由参观考察。周恩来强调，要争取他们来看边区机关、工厂、学校和其他单位，争取他们看后把边区的实际情况宣传出去。他还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进入边区后，在为期3个多月的实地走访中，记者们可以自由考察参观，不受任何约束。王震就曾在接待参观团时明确表示：“我现在重新向你们保证，你们有权自由考察我们的任何工作，我们最欢迎你们这样做。”其间，参观团成员既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林伯渠等党政军领导人，也自由参观了学校、医院、报社、工厂、边区保育院等机构，与作家、学生、工人、农民进行了广泛交流，围绕政府机构及其运作、“三三制”政权以及边区各项政策进行深入走访、座谈。8月下旬，5位外国记者还前往晋西北根据地，实地观察了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夜袭日寇汾阳据点的全过程。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不同，中共可以说是向记者们进行了全景式开放，并为他们的自由采访提供了一切可能的便利条件。对新闻工作者来说，这比任何的隆重款待都更为重要。美国记者斯坦因曾说：“看来对于我们的到来，他们是很高兴的，而且愿意协助我们工作。……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似乎是：用你们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我们。”

在此基础上，外国记者根据自己的直接观察和亲身体验撰写了大量的采访报道，以照片、电影、演讲等形式介绍了所见所闻。这些正面宣传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他们秉持真实、客观的新闻原则，对自身“眼见为实”的情况所进行的如实报道，没有任何的生编乱造或夸大其词。这与国民党政府人为制造的宣传有着根本的差别，也充分体现了中共的政策精神，即“对于美国记者及其他外国记者之来我区者，应帮助其自由采访及报导我区的真实情况”。

现状及应对措施，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罗荣桓被任命为连党代表。为什么会任命罗荣桓为连党代表？毛泽东后来说，就是因为他“老实”。1934年9月，红八军团在兴国集贤圩组建，罗荣桓被任命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军团长为周昆，政委为黄璜，在红一军团时，他们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师政委，都是罗荣桓的下级，但罗荣桓并没有在意，到任后全力配合他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1942年是山东抗战中最艰苦、最紧张的一年。就在这一年年底，因劳累过度，罗荣桓得了尿血的病。也是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决定在各根据地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让罗荣桓

积极提供新闻素材

事实上，外国记者在赴陕北访问之前，大都有备而来，即他们心里都有一些疑惑和问题想要弄清楚。斯诺在访问延安前心中积攒了众多的疑惑，如“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等。为了协助外国记者探明真相，中共除鼓励他们实地考察、自由参观外，还积极主动地提供他们所关心的新闻素材和资料，以利于他们更加深入地把握实际情况。在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周恩来明确提出，“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又要准备解答他们临时提出的问题”。在外国记者访问期间，边区政府负责人还给每位记者分发了李维汉起草的有关边区建设简述的书面材料，内容涉及边区的发展历史、政治纲领、经济状况、文化教育等，使之为对边区实际情况的了解更加全面。此外，中共提供的各种档案、文件、公开报道等资料，与记者们的亲见亲闻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极大增强了他们新闻报道的说服力，也形成了反驳各种不实之词的“证据链”。在安排记者团实地参观的同时，边区政府各部门还穿插安排了一系列的座谈会、招待会、领导人访谈等活动，向中外记者介绍宣传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和价值理念，如安排朱德、贺龙、叶剑英等军方代表接待，介绍中共的军事和抗战问题。

充分展现自身素养

外国记者来访，为中共打开了连通外部世界的渠道，也为外部世界观察、了解中共提供了难得的窗口和独特的视角。在这种实景式、全方位的参观考察过程中，记者们的所见所闻涉及中共的主要政策与基本立场、边区的建设情况与发展前途、民众的生活状况与精神面貌等众多方面。为了全面地把握情况，对中共领导人进行采访成为了外国记者的重头戏。而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中共领导人，并非国民党媒体渲染和外界传言中的“江洋大盗”“土匪流寇”，而是一群具有很高个人素养，待人诚恳、知识渊博、理想远大的人。他们不懈奋斗的精神、艰苦朴素的作风、彬彬有礼的态度、客观冷静的分析等，都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他们大为折服。在与斯诺的会谈中，毛泽东对当前形势的精辟分析和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局势的精准预测，使斯诺十分惊叹。斯特朗也认为：“毛泽东直率的言谈，渊博的知识，诗意的比喻，使这次谈话成为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为动人的谈话。”作为接待外国记者来访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同样给斯诺留下了“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的良好印象，“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而在国民党报纸上常被称为“赤匪头子”“杀人犯”的朱德，在外国记者眼中却是朴素的、亲和的“老农民”“好先生”形象，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固然让人印象深刻，但其“执著于生活，而又有民主作风”的生活态度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总之，中共领导人官兵平等的理念、民主亲和的风格和不拘繁文缛节的作风，给人以极强的亲和感、信赖感和认同感，极大地拉近了中共领导人与记者们的心理距离，与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无能、专制形成了鲜明对比。史沫特莱曾言：“到延安的外国记者感到非常安心，共产党员中间没有国民党那一套官场生活的形式主义和客套。提起延安的共产党人，有一个记者说得好：‘他们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这种说法在其他记者的嘴里我一再听到。”中共领导人在理想、信念、品格、意志、作风等方面展现出的人格魅力，不仅是一次个人素养的呈现，更是中共及边区人民有活力、有信心的一个缩影，外界也从中看到了一个有希望、有前途的中国。

（摘自2019年第4期《党的文献》，原标题为《中国共产党讲述“延安故事”的经验与启示——基于延安时期与外国记者互动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等职，由于经常超负荷工作，病情时常发作，有时开完一个会，就需要靠在沙发上休息好长时间。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罗荣桓身体状况，曾在他上报的一份干部任免书上写道：“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罗荣桓的“老实”，不仅仅在于他的忠厚，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还在于他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人曾问罗荣桓：“你在山东的那几年，我们大家都感到工作好做，心情舒畅，这是怎么回事？”罗荣桓只简要说了两句：“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实事求是对待革命，对待同志嘛！”延安整风后期，康生夸大敌情，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罗荣桓结合山东实际，正确估计干部队伍的政治状况，认为潜伏在党内的坏分子只是个别的，不赞成放任自流式地发扬民主以暴露敌人的方法，认为在敌后、在部队中不宜这样搞。当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传到山东后，罗荣桓看了一遍

陈云的皮箱

□ 孟兰英

在陈云纪念馆里，有一只跟随了陈云60多年的旧皮箱。这是一只棕色皮箱，长80厘米，宽40厘米。棕色的牛皮面，内衬的白布早已发黄破损，里边的两根皮扣带也早已不能使用。箱体表面的牛皮已经起毛磨破，有的地方因脏旧颜色变深了，有的地方因磨薄颜色变浅了，有的地方露出了里衬的黄色硬纸板。陈云一直把它摆放在卧室衣柜顶上，每次外出工作、视察时，总是提着这只皮箱。据工作人员回忆，1994年，89岁高龄的陈云最后一次到上海时，用的仍然是这只旧皮箱。

这只皮箱是1933年初买的，那时陈云还在上海、江苏一带从事秘密工作。1932年10月下旬，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为了保存实力，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的“三驾马车”——博古、张闻天、陈云3人决定前往江西苏区。为了方便转移途中掩护身份，临行前，陈云买下了这只棕色皮箱。自此以后，这只皮箱就一直跟随陈云南征北战，见证了陈云一生中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

1933年1月下旬，陈云提着这只皮箱秘密离开上海，踏上了前往江西苏区的路程。经过数日的长途跋涉，历尽艰险，他终于踏上了中央苏区的土地。多年来，陈云一直在国统区从事秘密工作，每天要小心翼翼；现在终于踏上自己的土地，总算到家了，可以自由地呼吸了，可以高声说话了。一向深沉

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一个艰苦的阶段。建阳县（现江苏省建湖县）县委县政府临时驻扎在长北滩，县委县政府机关设在王氏宗祠，工作人员分住在长北滩群众家里。那时，干部群众是血肉相连的关系，亲密得像一家人。遇到紧急情况时，群众们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做掩护工作。为答谢长北滩人民的深情厚谊，县委县政府决定在除夕夜办几桌便饭，请各位“房东”来聚一聚。

当时建阳县成立不到半年，政府机关人员的给养十分不足，加上敌人对我根据地开始全面封锁，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办饭的菜肴，拿什么来宴请乡亲？正当县委书记金楠、县长唐君照为难之时，粮食科长虞廷松出了好主意，他说：“仓库内存有一坛子路墩糟坊产的地方酒，还有40多斤黄豆，这些都是知名人士杨幼樵老先生送来慰问县里同志的，一直未敢动用，现在可派上用场了，用黄豆做豆腐，用豆腐宴招待乡亲们，同样能热热闹闹。”

县委县政府赞同这一设想，随即向当时兼任中共苏北区委书记的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作了报告，黄克诚十分支持，并托县领导向乡亲们问新年好。得到批准后，县领导一边安排人浸豆子、磨豆浆、做豆腐，一边写春联、剪彩旗，张灯结彩，布置豆腐宴现场。

除夕下午，县领导亲自登门，请来了前庄后舍20多位“房东”和几位农救会代表。待客人到齐就座后，炊事班开始上菜，全是豆腐“翻新”，有辣豆腐、焖豆腐、炸豆腐、豆腐羹、豆腐丸子、红烧萝卜豆腐、青菜豆腐汤……

唐君照作了开场白。他首先向长北滩父老乡亲拜年，并转达了黄克诚对乡亲们的新年祝福。“感谢大家对县委、县政府工作的支持，战时无以待客，豆腐、水酒不成敬意。”他举起杯，请在座一齐干杯。

金楠一边敬酒，一边满怀歉意地说：“这里没有打百叶、做茶干的工具，只能在豆腐上做文章，让诸位见笑了。”席间，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称赞，都说县领导费心了，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支持政府抗

含蓄的陈云这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皮箱一扔，躺在中央苏区的土地上，连喊三声“共产主义万岁”。

1935年初，出席遵义会议后不久，陈云肩负着恢复上海的秘密工作和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双重使命，离开长征队伍，前往上海。由于此行必须轻装，临行前，他把有关的文件整理后装在这只皮箱里，其中就有那份上交共产国际的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后来，这些文件作为重要档案转送到了苏联，并被完整保存下来，为中国革命保留了重要的史料。

1949年，三大战役相继取得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望，谁来统筹全国经济、发展生产？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想到了远在东北的陈云。5月13日，陈云把简单的行李装在这只皮箱里，从沈阳出发，前往北平主持中央财经工作。

从1933年被陈云买下，到1995年他逝世，这只棕色皮箱跟随陈云走过了62年的沧桑岁月。

（摘自2015年第11期《党史纵览》，原标题为《陈云：四件遗物见精神》）



一场豆腐宴

□ 王学言 胥加洲

日是应该的，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能吃到“白马肉”（百姓对豆腐的美称），就算有口福了。

宴会开始后不久，县总队副总队长郑贵卿带着胜利的喜悦推门而入，开口就向大家报告好消息，说是今天下午接到情报，得知西荡一伙土匪回马厂崔家楼老窝过年，我总队立即派出一支武装，配合一区区委，包围了土匪窝，30名匪徒当场被捕获，还缴获快慢机、驳壳枪两支，白朗手枪一支，子弹44发，我方无一伤亡。

大家听了拍手称快，连忙请郑贵卿入席，向他敬上一杯胜利酒。他又向在座各位回敬了一杯，这时群情振奋，大家兴高采烈，欢呼胜利，迎接新年。散席后，乡亲们回去就放鞭炮，祝贺新年大胜。各家各户鞭炮齐鸣，长北滩人民迎来了新春。

70多年过去了，长北滩这场别开生面的豆腐宴，至今仍被当地群众传为佳话。

（摘自2020年6月2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便要求“不要下发”。由于罗荣桓反对“逼供信”，坚决执行中央“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及时向中央报告山东分局的做法，并且得到中央的支持，避免了反奸斗争的扩大化，保证了山东分局整风运动的健康开展。

罗荣桓临终前对子女们说：“我当然愿意不死，为党继续工作，可是既然死已经来到，这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什么也没有给你们留下，只希望你们坚信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罗荣桓去世后，毛泽东给予他高度评价：“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摘自2020年6月22日《北京日报》）

